

事实胜于雄辩

——驳“丁村文化等来自西方”的谬论

张 森 水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 奴役别国人民, 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 一贯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历史的手法, 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霸权主义摇旗呐喊, 为被恩格斯早就指出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的沙俄侵略行径辩解, 把老沙皇这一侵华大盗歌颂为“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 胡设在俄国人来到黑龙江流域以前, “既无满洲人, 更无中国人居住过”。在苏共 24 大讲台上, 苏修官员竟然无耻地宣称黑龙江两岸“历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伟大的列宁早已指出: “俄国对中国、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加里西亚实行掠夺政策, 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可见, 新沙皇不仅是老沙皇衣钵的忠实继承人, 而且是列宁事业的可耻叛徒。

在反华大合唱的队伍中, 苏修御用学者奥克拉德尼柯夫和华西里耶夫算得上是两个吹鼓手。他们挂着“考古学家”、“古代史学家”的招牌, 肆意歪曲地下出土文物的原貌, 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 信口雌黄, 捏造中国古代文明的外来因素。其实, 这并非苏修首创, 实质是老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下简称“西来说”)的改头换面的货色罢了。在其中, 称得起反面样板的就有华西里耶夫在 1964 年《亚非人民》杂志上写的题为《关于外因影响在中国文明发生中的作用》一文。在这篇奇文中, 他睁眼不看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的进展, 避开中国旧石器考古材料, 武断地说: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继承性的论点, 未必是可以无条件接受的, 例如北京猿人同丁村人相距几十万年, 而丁村的旧石器制造却通过蒙古的旧石器时代和西方的文化(莫斯特期)相近, 关于山顶洞人也可以这样讲。”在这段文字里, 华西里耶夫提出了三个问题: 丁村文化与莫斯特文化关系问题; 山顶洞文化西来的问题; 和中国旧石器文化系列继承性问题。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来回答吧!

丁村文化与莫斯特文化关系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 只要把两者主要文化内涵作一简要的对比, 就能拨开迷雾, 弄清真相。

莫斯特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 其文化的创造者是尼安德特人。这个时期的文化, 以石片石器为主要特征。在打石片以前, 对石核要加以修理, 常呈盘形和龟盖形, 由这样的石核上可打下三角形石片。莫斯特石片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总的说来, 长度增加, 宽度缩小, 厚度减薄, 演变成薄而窄长的三角形, 同时存在一些砸击石片。用三角形石片做的石器主要有两类: 心形尖状器和半月形刮削器。在乌克兰境内, 还发现用石片做的雕刻器。莫斯特尖状器和刮削器是用指垫法(即所谓莫斯特技术)修理成的。指垫法就是用手指衬垫在石片边缘上, 而后用石锤轻敲细琢石片边缘, 用这种方法做成的石

器,高度定型,边缘匀称,小石片疤浅平而呈台阶状。还有一类石器——三角形小手斧,系两面交互打击成的。这些石器类型代表着莫斯特文化的重要内涵(图 1, 1、2)。

丁村文化,其自身有一定的代表性,因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而得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最早的文化,分布于山西省的汾河流域。

丁村石器材料中的石核常呈多面体,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等进行打片,打下粗大的石片,往往是宽大于长,台面大而倾斜,石片角大,最大者达 142° ,一般多在 111° — 130° ,半锥体大而散漫。与此相反,莫斯特石片不仅形态与丁村者不同,石片上诸人工特点亦不相象,莫斯特石片台面小,常有细致的修理痕迹,石片角一般在 100° 左右,半锥体小而凸等。丁村石器主要是用粗大石片和石核做的单刃和复刃砍砸器、定型的石球和大三稜尖状器。后者为丁村文化所特有,故又叫“丁村尖状器”。这是一种既可挖掘,又能砍砸的石器。大型砍砸器和大三稜尖状器是欧洲莫斯特文化所罕见或没有的。在丁村遗址里,曾找到过一些小的尖状器和刮削器,无论从形态上或制法上与莫斯特尖状器和刮削器都不同。另外,丁村石器加工技术亦与莫斯特技术各异,系用石锤直接打击,刃缘不平齐,呈多缺口状。在丁村没有发现过三角形小手斧(图 1, 3-8)。

“有比较才能鉴别”。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的丁村文化和欧洲的莫斯特文化从石核、石片、石器的尺寸上、类型上,以及制作技术上都有非常清楚的区别,不可能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更无来自欧洲莫斯特文化可言。依地层对比,丁村文化在时代上要比欧洲莫斯特文化稍早一些。如果按照华西里耶夫所炮制的新的“西来说”的逻辑,将会得出何等荒唐的结论。

周口店山顶洞文化也来自西方吗?否!在这个问题上,华西里耶夫根本不敢面对事实,东拼西凑了一点“材料”,便强词夺理地说:“关于山顶洞人也可以这样讲”。能不能言之成理,要靠客观材料,不能凭诡辩。华西里耶夫无可奈何地承认,解放后对山顶洞人重新研究的成果:“归于广义的原始蒙古人种”,但又毫无道理的强调“还有欧罗巴人种的征状”。这完全是徒劳之举。

华西里耶夫为了给他的山顶洞文化“西来说”找根据,好不容易找出山顶洞人墓葬撒有赤铁矿粉这一事实,因为西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也有这种遗迹,便以为抓到“西来说”的证据。这种推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远古,历史发展不平衡倾向要比现代小得多。同时代的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或氏族常处于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似的生产关系,因之,有可能采用类似的制造石器的技术,创造出部分相似的文化内容,会出现某些相同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相应地人们的文化生活、抽象思维也有所发展。在世界各地此时普遍出现埋葬的习俗,并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和放一些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随葬。这些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反映对氏族成员一视同仁的爱护,另一方面反映唯心意识的发展。据某些民族学的资料,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类似现象,在现存的某些民族中也不乏实例,根本不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远道传入。“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来是不足为怪的,但华西里耶夫偏要拿山顶洞人在墓葬中给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这一文化现象来大做文章,其手法是拙劣的。

依常识,在讨论某一地区或某一时代的旧石器文化关系时,石器的类型和制作技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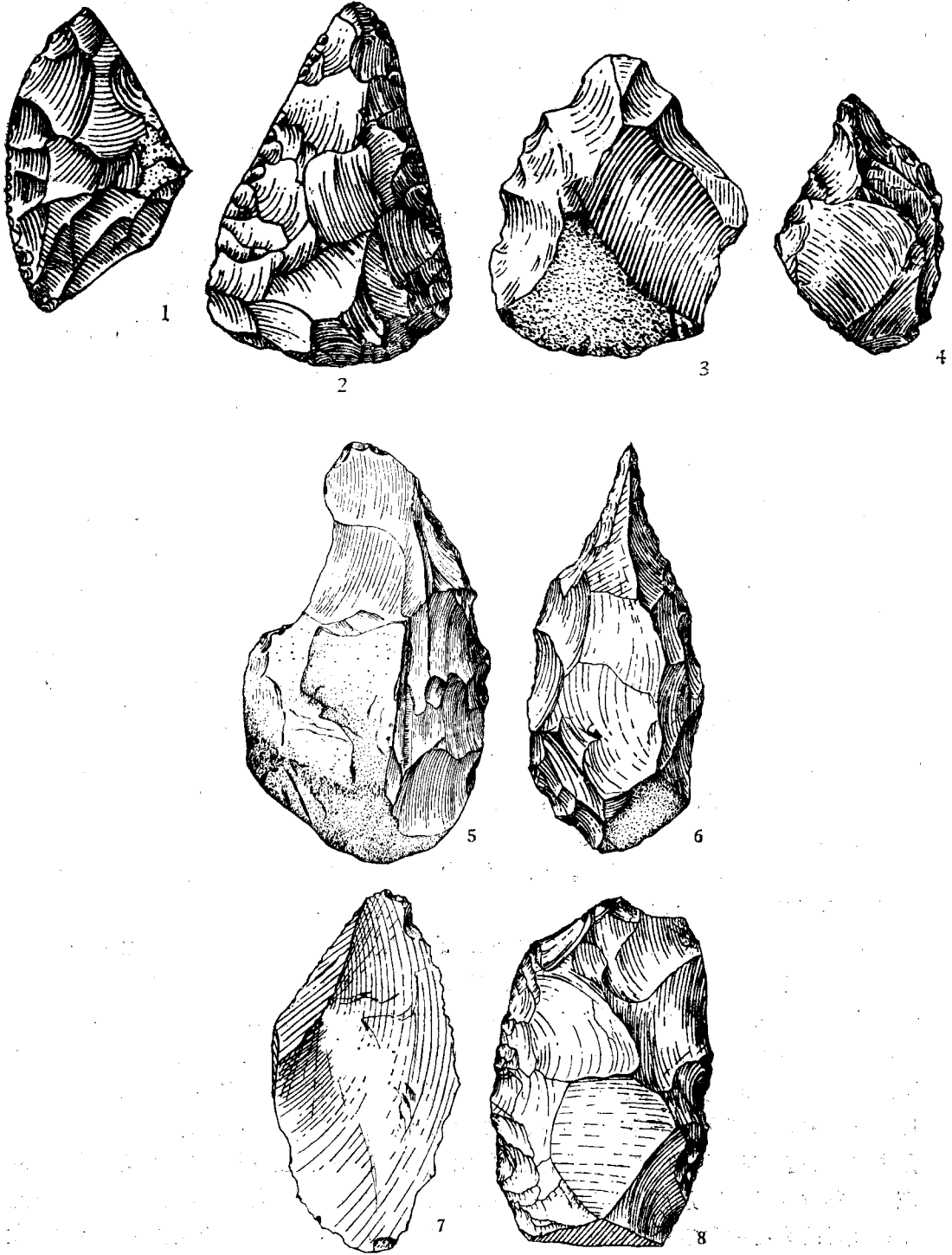


图 1

1, 莫斯特刮削器, $\times 2/3$; 2, 三角形小手斧, $\times 2/3$; 3, 丁村小尖状器, $\times 1$; 4, 丁村小尖状器, $\times 1$;
 5, 丁村单边形器, $\times 1/3$; 6, 丁村厚尖状器, $\times 1/3$; 7, 丁村单边形器, $\times 1/3$; 8, 丁村多边形器, $\times 1/3$ 。

比较是十分必要的。华西里耶夫硬要把山顶洞文化扣上“西来说”的帽子,却矢口不谈山顶洞的石器,更不敢将它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一哪怕是最简单的比较。

山顶洞位于周口店龙骨山的顶部,1930年发现,1933年和1934年发掘。除发现大量的装饰品和骨针等外,还找到少量的石器。其中有:燧石石片两件,凹刃和端刃刮削器各一件(还有燧石原料一块);在洞内找到各种石质的大小砾石不少,但加工过的仅有三块。其一为砍砸器,其上端和右侧中下部系交互打击成刃,刃缘呈锯齿状,下端仅有粗略的加工,另两件系粗砂岩砾石,一侧有交互打击痕迹。脉石英是山顶洞人做石器常用的原料,沿用砸击法加工。其中有十七件有人工打击的痕迹,至少有一件是两端石片,另一件既可能是两端石片,也可能是两端修理过的复刃刮削器,还有一件(稍残)是错向加工成的,可能是尖状器,至少是一件复刃刮削器。另有脉石英多面体石核和周边有打击痕迹的脉石英片各一件。这些石器材料,虽然不能代表山顶洞人做石器的水平,但却表现出与北京猿人石器的亲密关系。山顶洞人打片和制造石器的技术、类型都与北京猿人者有一定的相似性。那末山顶洞石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的关系如何呢?只要稍加比较,技术传统泾渭分明,亲疏关系一目了然。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属于长石片-石叶传统,包括奥瑞纳文化、稍晚的梭鲁特文化(起源于东欧),进而发展到马格特林文化。用以打片的石核,事先经过加工,具一定形状,如稜柱形和锥形等。用间接打片法打剥石片,它的两侧几近平行,长而薄,断面多呈梯形,时间越晚,石片变小变薄。至马格特林期,基本上细化成石叶工业。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大体上是用长石片或石叶做成的,有各种端刮器和雕刻器。不同文化还有自己代表性器物。奥瑞纳文化中有用垂直打击的尖状器和船底形刮削器,梭鲁特文化更有自身的特色,著名的有桂叶形尖状器、各种带肩的尖状器,有些地方出现箭头;这种文化采用了新的压制修理石器的技术,做成的石器长薄而规整,器面上小石片疤平远而规则地成鳞片状排列。马格特林文化的石器则是由奥瑞纳期细化而来,并有鱼叉等多种骨器。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识,毋庸多费笔墨。

关于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继承问题,华西里耶夫叫嚷不予承认。他承认与否是一回事,但客观的存在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旧石器文化,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遗址或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或因原料来源与质料的差异,在局部有一些不完全相象的地方,是客观存在的,这应是次要的。从总的来看,“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已经得到了地下出土的丰富文物所证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从早至晚,自猿人阶段经古人阶段到新人阶段的文化发展脉络是清楚的。中国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以石片石器为主,单向反面修理和石锤直接打琢为主体的石器加工方式方法,刮削器和尖状器是中国旧石器工具组合的重要成分,砍砸器由多到少,雕刻器出现早、类型少等。相反,欧洲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重要工具——手斧,几乎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组合的成分。丁村发现的大石片和各种砍砸器(包括大三稜尖状器)是中国的猿人阶段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小型尖状器和刮削器无论从形态上和做法上都与北京猿人同类石器比较相似,石球在北京猿人时代已具雏形,发展至丁村期则定型化。最近,在辽宁省喀左县水泉公社后城子大队的鸽子洞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无论从石器制作技术上、类型上或石器

大小上都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和第十五地点者十分相近,因之,在文化上与北京猿人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¹⁾。鸽子洞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扩大了北京猿人文化向北发展的范围,增加了中国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一个环索。北京猿人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用砸击法打剥石片,打下小型的长方形的两端石片,砸击石片,不仅见于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鸽子洞遗址中,也见于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遗址、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小南海遗址、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这种清楚的相承关系难道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还需指出,砸击石片和雕刻器,在欧洲,最早出现于莫斯特期,在时间上要比北京猿人晚得多。

以上这些事实和常识,华西里耶夫之流不知道吗? 决不能这样来认识问题。他们这种混淆视听的作法,除了说明修正主义者的愚蠢外,更要警惕的是其险恶的政治用心。在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西来说”的出笼和雀噪的历史是很有教益的。“西来说”出笼已有一百多年了,是适应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我国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此后曾几度甚嚣尘上,也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我国,变我国为殖民地的政治需要。今天,苏修文人从老殖民主义陈旧武器库里找出“西来说”,到处招摇撞骗,其目的不言自明。

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捏造历史的人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欧美资本主义所炮制的“西来说”早已垮台了,苏修新“西来说”之所以又在喧闹,这是反动派的本性决定的。可以肯定,等待新“西来说”的命运将和旧“西来说”一样,落得个可耻下场。新沙皇拜倒在老沙皇脚下,其结局决不会比他前辈好些。

1) 《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3(2), 第 135 页。